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读书笔记)

一九六八年二月

最高指示

不可盲目地学，要有分析，要批判地学。不可以搞成一种偏向，对外国地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用。

学外国地东西，不等于统统进口，硬搬外国的一套，要批判地吸取。向古人学习是为了今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中国人。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党内通讯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内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而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关于读书的建议

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那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那些说的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作者对于所要说的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是自己获得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的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各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些最有兴趣。同志们以为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目 录

第一部分	1
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1
二、关于过度时期	2
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3
四、关于和平过渡问题	6
五、关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7
六、关于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	7
七、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问题	9
八、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
九、关于中农	10
十、关于工农联盟	12
十一、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13
十二、关于战争和革命	14
十三、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	15
十四、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关系	15
十五、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只靠机器	16
十六、大工业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吗?	17
十七、列宁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	17
十八、工业化的高速度是个尖锐的问题	18
十九、大、中、小并举是为了高速度	18

二十、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长期并存么？	18
二十一、所谓“彻底巩固”	20
二十二、关于战争与和平	22
二十三、“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么？	24
二十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权利	24
二十五、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是革命？	25
二十六、所谓“中国没有必要采取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	26
二十七、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期限	28
二十八、再谈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	28
第二部分	30
二十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30
三十、集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31
三十一、关于个人财产	32
三十二、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33
三十三、关于认识的辩证过程	34
关于工会和一长制	35
三十四、从原则出发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36
三十五、先进经验能够毫无阻碍的推广吗？	36
三十六、关于计划工作	37
三十七、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问题	39
三十八、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	39
三十九、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	40

四十、关于平衡和不平衡	41
四十一、关于所谓“物质刺激”	44
四十二、关于社会主义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	47
四十三、关于突击和超任务	47
四十四、关于价值规律于计划工作	48
四十五、关于工资形式	50
四十六、关于价格的两个问题	50
第三部分	51
四十七、关于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	51
四十八、先有拖拉机还是先有合作社？	53
四十九、关于“一大二公”	54
五十、特别强调物质利益的原因何在	54
五十一、事在人为	55
五十二、关于运输和商品	56
五十三、关于工农业并举	57
五十四、关于积累水平问题	58
第四部分	59
五十五、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	59
五十六、关于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59
五十七、关于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前途	60
五十八、关于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距	61
五十九、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建立经济体系问题	61

六十、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能够“拉平”么？	63
六十一、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	63
六十二、关于世界两个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	63
六十三、关于斯大林的批语	64
六十四、对教科书总的看法	65
六十五、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	69
六十六、关于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方法	70
六十七、哲学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72
補遺	73
(一) 关于我国的工业化的问题	73
(二) 关于人的地位和能力	74
(三) 关于依靠群众的问题	76
(四) 关于苏联和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比较	77
(五) 关于总路线的形式和巩固的过程	78
(六) 关于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及其他	81
(七) 中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能够最迅速	82
对斯大林《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语	82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问题（综合汇编）	96
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	96
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辩证法	96
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	97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	97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98
一批二帮	98
“地段责任制”的反动实质	99
为什么我们必须肯定成绩	99
看问题要看本质，要看主流	99
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	100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103
有紧张，有休整	104
对立面转化	105
听取对立面的意见	105
“死”活斗争问题	105
真理与谬误是对立的，正确是与错误斗争产生的	106
设置对立面	106
设置对立面很重要	108
研究辩证法问题	108
对同志要采取辩证法的方法	111
是非关系	114
十个指头的问题	115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	115
辩证法则是对立的统一的看待问题所以是全面的	117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	117
片面性有两种	118

两种片面性	120
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	121
两种可能性问题	121
两种可能性	123
波浪式的规律展发前进是必然的	124
任何事物都要统一性和独立性	124
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	125
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	125

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 笔记）

一九五九年末到一九六零年初

注：这个笔记所指的是教科书的页码，是一九六〇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体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版增订本，下册）的页码。

第一部分

（从第十二章到第二十三章）

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教科书中第一页到第二页上说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要用“革命手段”。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些说法都很好。是应该这样说的。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说是客观必然性，就是说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它总是要来的。

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页一）这个说法很对。但是在这里还应该说到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

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页二），其实不只是“不能成长起来”，而且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说不上成长。这是我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二、关于过度时期

书中说：“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人物的实现。建立起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页三）。究竟过度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研究。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呢？

这里引了马克思的话：“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就是处在这个转变时期中。我们的人民公社要在若干年内实现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并且要进一步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实现了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

在过度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页三）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当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页三）。在我国看来，大约至少要有一、二亿吨钢吧。今年以前，

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刚开始。经过了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以后，一九六〇年将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年。

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书中说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又说“每一个国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页四）这个提法好。在一八四八年有了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了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九年的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承认十月革命的榜样，承认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同修正主义对立起来了。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很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为什么无产阶级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教科书说是由于“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革命的中心是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后，十九世纪中叶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俄国；随后革命的中心又转移到了中国。当然，以后革命的中心还会转移。

俄国革命的胜利还因为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做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教科书说：“俄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结成了同盟。”农民中有几个阶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贫农阶层。在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农总是动摇的，他要看一看革命有没有力量，能不能站住，革命对他有没有好处，看得比较清楚了，他才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十月革命是这样，我国的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也都是这样。

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是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起来的。没有列宁主义，也不可能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里。书中所引列宁的话（页六）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需要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时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被压迫的痛苦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在这些方面说来，印度也是相同。那末为什么印度不能像列宁、斯大林说的那样，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呢？印度曾是属于英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点和中国不同，中国是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印度的共产党没有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到了印度独立以后，又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有一个成熟的党是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了与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一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在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时，还没有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了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无产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正当代替了资产阶级政党，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是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一年，那时他们的革命活动很有生气。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已经堕落，到了一九二四年，没有办法，只好求共产党，才能看到前途。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时候还不成熟，从主要意义来说，就是指我们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可能，并且也没有作应对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书上在这里（第六页第三、四段）还有这样的思想：资本主义前的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之所以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于现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这样说是不完全的。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是由于我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是这种帮助不能决定我

们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够影响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以后前进得快点或慢点得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点，没有帮助会慢一点。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四、关于和平过渡问题

书上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页五）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武装到了牙齿，它们能让你和平取得政权吗？

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准备两手，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用暴力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看到，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让步，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和我国革命，都曾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列宁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表明了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就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地武装政权以后，列宁还是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五、关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第五页最后一段说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但没有讲清楚。

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即宣布土地国有令，但在完成是民主土地改革的问题上，也还用了一段时间。

我国在解放战争中，解决民主革命任务。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

我们在解放战争中，除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外，还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括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官僚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日本、德国、意大利手中接收过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重是八比二。我们解放后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全部消灭了。

如果以为在我们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六、关于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页上对暴力这个概念使用得不确切，马克思、恩格斯总是讲，国家就是用来镇压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关。那么怎么能够说：“无产阶级

级专政不仅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呢？

剥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们看到革命一起来，他们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书说：“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武力反对人民政权”。这个说法不完全，不仅是在人民已经组织了革命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人民起来向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就要用暴力来镇压革命的人民。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怎么能行呢？

书中在这里还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也说得不完全。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的改造。地主、官僚、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农民也要改造。我们的经验证明，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都是不能改造好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和他们的影响，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甚至要半个世纪。在农村来说，基本社有制实现了，社有转成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大工业，全国的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的情况真正全国转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逐步以至全面地变过来。（按书中在这里讲到“主要任务”时引用了列宁的话，与列宁的原意是不符合的）

说话、写文章都力求合乎敌人、帝国主义的口味，这是欺骗群众，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而自己的阶级被蒙蔽了。

七、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问题

第十页上说：“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这是对的。但是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代表会，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代表，有其他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一部分人想闹事，但闹不起来。这种情况好像是和苏维埃不同，但是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等。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的国家机关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部门的成员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

八、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十一页上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社会注意国家所有制的过程说得不对。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政策，对于官僚资本的财产，我们是采取没收的办法来实现公有化的。

十六页得第二段的意思是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当成一种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西欧

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统治地位，但同时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在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以后，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但中、小资本也一律没收吗？是不是也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

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以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

日本人过去在东北的办法是消灭当地的大资本家，把他们的企业变为日本的国营企业或垄断资本企业；而对当地的中、小资本家则用建立母子公司的办法加以控制。

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就每个步骤说，也是逐步进行的，这种办法使生产没有遭到什么破坏，而且在改造过程中发展了。我们在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有许多新的经验，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项新经验。

九、关于中农

我们土地改革后，土地不值钱，农民不敢“冒尖”。有的同志曾经认为这种情况不好。其实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臭，这是一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在政治上已压倒富

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

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十七页）不搞阶级斗争，不高群众运动，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交给农民来分，这是一种恩赐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是依靠贫农，联合大多数中农（下中农）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党起引导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并且有一套具体的做法，就是访问贫农，物色积极分子，扎根串连，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展开阶级斗争。

教科书中说：“中农成了农村中的中心人物”。（十七页）这个说法不对。把中农吹成中心人物，捧到天上去，不敢得罪他们，会使过去的贫农脸上无光，其结果必然被富裕中农掌握农村的领导权。

书中对于中农没有分析，我们把中农分成上中农、下中农，其中还有新老区别，新的又比老的好一些。历次运动的经验证明：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这三部分人政治态度较好，拥护人民公社的是他们，在上中农、富裕中农中，一部分人拥护人民公社，一部分反对人民公社。河北省的材料，全省共有四万多个生产队，其中百分之五十完全拥护人民公社，没有动摇；又百分之十五的队或者反对人民公社，或者发生严重动摇。这些队所以反对或严重动摇，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富裕中农手里，甚至掌握在坏分子手里。在这次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教育中，这些队要开展辩论，首先要改变领导。可见对中农需要进行分析。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

书上说：“中农按其本性来说是两重性的”。对这个问题也要做具体分析。贫农、下中农、富裕中农、上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作为私有者来说，他们的私有观点是各不相同的。贫农和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点比较容易改变。上中农和富裕中农的私有观点就比较浓厚，历来他们对合作社就有抵触。

十、关于工农联盟

十八页讲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叙述工农联盟怎样才能发展和巩固。讲了对小生产者农民要进行改造，但没有叙述改造的过程，没有讲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有什么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没有叙述整个改造过程中的步骤和策略。

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是建立在土改的基础上；第二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销售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销售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实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到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还必须从合作化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的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在国有化和机械化互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把工农联盟真正巩固起来，工农之间的差别就将逐步消失。

十一、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十九页第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有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需要进行改造。刘绍棠当了作家以后，大反社会主义，就证明。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有些人把知识当作自己财产，待价而沽，没有高价就不出卖，他们只专不红，说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搞电影的说党不能领导电影；搞歌舞的说党不能领导歌舞；搞原子能的说党不能领导原子能科学事业。总之，说党不能领导一切。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改造客观世界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不重视这个问题，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迁就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

同页上说到过渡时期的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是这里只说在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不完全的。我们的说法是在三条战线上，即经济、政治、思想的战线上都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说我们吸收资产阶级分子来参加企业的管理和国家的管理（二十页）也可以这样说。但我们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世界观以及个别问题的观点。书上在这里都不提改造。

十二、关于战争和革命

书上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三十三页）。又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没有经过国内战争”（三十六页）。应当说：这些国家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的，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合而为一地进行的，这些国家的反动派是用苏联红军铁犁犁掉了的。说这些国家没有国内战争，是只从形式看问题，没有看到实质的说法。

教科书中说：东欧各国在革命后“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三十六页）其实这种议会同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完全不同，只是名义上相同。我们解放初期的政治协商会议，名义上是同国民党时期的政治协商会议一样的。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我们对政治协商会议不感兴趣，蒋介石却很有兴趣。解放后我们把这个招牌接过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了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教科书说：中国“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三十九页），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起一直到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连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在这以前，从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还有十五年的战争，其中包括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我们党产生以后参加和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有三十年。

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只是到真正的坏处，不看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问题上的片面性。片面地讲战争的毁灭性，对于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十三、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在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工人阶级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着工党走。

列宁所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二十四页），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想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革命成功以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在东方象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超过先进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二十世纪初德国超过了英国。

十四、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关系

第三十至三十一页上，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看做是农业集体化的前提，这种说法，并不符于苏联自己的情况。苏联基本上实现集体化是

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那个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虽然比我们多，但是在一九二三年机耕地的面积，还不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集体化完成得慢，重要的原因是在土地改革以后，没有趁热打铁，而且间歇了一个时间，我们的一些根据地也出现过一部分农民满足于土地改革而不愿意再向前进的现象。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工业化。

十五、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只靠机器

八十五页上说：“机器拖拉机站，是对于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强调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一个大问题。

九十一页上讲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初期的任务，提到和敌对富农分子的斗争等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教科书对于合作化以后农村情况的叙述，却不讲富裕阶层的问题，也不讲内部矛盾。例如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等等。

九十九页上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条件下，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在动摇。”不能笼统这样说，一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

十六、大工业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吗？

教科书说：“走上社会主义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四十八页）。这里把发展大工业说成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的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社会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要改造新的社会舆论。以推进革命，在革命中推翻了旧的上层建筑以后，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可以大闹技术革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的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关系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记得很清楚。

十七、列宁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

第六十九页上引用列宁的一段话，讲得很好，可以用来辩护我们的作法。他讲到：“居民的觉悟程度和现实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会一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的尝试。

十八、工业化的高速度是个尖锐的问题

教科书说：“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六十四页）。现在在我国，速度问题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愈落后，速度问题就愈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是这样，就在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方的投资相对地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原有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就会增加得很快。上海解放十年一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多元；它原有工人五十多万人，除了调出几十万人以外，现在全市有工人一百一十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方，速度问题更加尖锐。

十九、大、中、小并举是为了高速度

第七十一页虽然提高了我们广泛发展中、小型企业，但并没有正确地反映我们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问题并不只是在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增加就业，在大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在洋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主要是为了提高速度。

二十、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长期并存么？

教科书上七十九页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两种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

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这个说当然是正确的。由此推论下去，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盾，教科书上不承认这个矛盾。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同样会“愈来愈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原料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而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这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与分配。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应生产力，过一些时候就不合适了。我国在完成高级合作化以后，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出现了小社变大社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一些经济范畴，是永远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集体所有制这些范畴是永远不变的，而不象其他范畴一样是历史范畴吗？

二十一、所谓“彻底巩固”

“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一〇五页）。“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够彻底呢？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拿蚕的一生来说，不但它最后一定死亡，而且在它一生的发展过程中，要经过蚕子、茧、蛹、飞蛾这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要进到最后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了新的质（新下来的好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再从蚕子到茧、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是只是量的变化，而且有质的变化——是部分的质变。人也是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出生到死，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没有质的变化？人的机体里，细胞不断的分裂。不断的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人死了就达到整个的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不断的量变，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中有量变，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要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的质变。如果没有部分质变，没有大量的量变，最后的质变也不能到来。例如，一个工厂，厂房有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部分地更新，这就是部分的质变。工厂的规模、外形没有变，

但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一样，一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的战斗，不断的补充，伤亡了几十个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的战斗，不断的补充，就是这样，经过不断的部分的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地发展和坚强起来。

打倒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使用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部分的质变。在解放战争时期，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组成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难道就没有它进一步的变化过程吗？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长远地“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死亡变化吗？难道不象其他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要灭亡。共产主义时期也还是有不断发展的。能够说到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了，就只有量变，再没有不断地部分的质变么？

事物的发展一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进行的，但是每一个阶段总

是有一个“边”。我们每天读书，从四点开始，到七、八点结束，这就是“边”。拿思想改造来说，社会主义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是每一次思想改造，总是有个结束，就是有个“边”。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的战线上，经过不断的量变，不断的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到那时，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然后又会在新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

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不发达的共产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由不发达的共产主义到比较发达的共产主义。后一段可能需要比前一段更长的时间。经过了后一阶段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大为丰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了。

一〇八页上说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生产不断迅速扩大，生产率不断提高。讲了许多“不断”，但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许多部分的质变。

二十二、关于战争与和平

一零七页上说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使失业人数增加”。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忽然不灵了吗？难道在世界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

时候。就能够彻底消灭战争么？

能不能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世界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情况和无产阶级统治下的情况区分开来。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于我们，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仗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曾经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还是用常规武器。即使在两个阵营之间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可能打，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战争是阶级冲突的方法，只有经过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阶级才能够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就能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在人类的阶级社会史上，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注意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军队是阶级的实力的具体表现。只要有阶级对抗，就有军队。当然我们是不希望打仗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的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来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一〇九页上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了，这个说法

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已经同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种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我们和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没有眼睛，它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空军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苏联现在已经不是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

二十三、“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么？

一一四页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团结一致，坚如磐石”，说一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只承认团结一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不承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是被否定了，辩证法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二十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权利

一一五页上讲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力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力。这是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制度，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力的问题。如果这类东西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的手里，那么全国绝大多数迫切需要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钟惦裴这些人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机关、一切企业掌握在那一派手里头，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的手中，这些机关，这些企业就可能变质，人民对这些机关，这些企业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力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部分人管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二十五、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是革命？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不是要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一一九页）。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革命。我国的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再从集体经济变为全民经济，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

当然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物资能够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供应，然后根据生产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中去。

拿我们的人民公社的发展来说，在以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度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营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实现基本社有制，对于社员，一般都是有利的。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他们不能象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于这种改变会不会抵触呢？

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阶级，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变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二十六、所谓“中国没有必要采取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

十二页上的第一段说得不对。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看到那个时候俄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形，断定无产阶级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没有力量保持

自己的政权，认为只要他们动手，就能使无产阶级政权垮台。于是他们实行武装反抗。这就逼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激烈的办法，来没收他们的资产。那时候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都还没有经验。

说中国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符合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了。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打垮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没收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法加以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争。

一二三页上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描写得不对。解放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逼出来得。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够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资本家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并不是“公方代表和资本家共同管理生产”。不能说“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受到了限制”，而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教科书上没有吸收我们所说的公私合营企业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这个意思。当然现在来说，已经不是四分之三而是十分之九，甚至更多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机会，他们还是会

猖狂进攻的。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被我们打退了，一九五八年又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表向我们进行了一次进攻。我们对民族资本家的策略是：拉住他们，又套住他们。

书上引用列宁的话（一二二页），国家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是对的。

二十七、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期限

一二六页上说，我们在一九五九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这样说，而是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同页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以内，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到可以同意。这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再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到一九七二年，争取提前二、三年，到一九六九年，除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外，还要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

二十八、再谈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

一二六页上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业实现以前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强大的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段话讲的不对。

东欧这些国家，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

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

关于工业化和所有制改造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也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力，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先是简单的协作，然后发展为工场手工业，这时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工场手工业还不是用机器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创造了条件。在英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也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造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再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有些不同（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中逐步成长起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部分

(从第二十四章到第二十九章)

二十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第一四〇页上只是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而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可以说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面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总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管理，这仍是重要问题。一九五八年有的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必须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妨碍这种积极性，就不利于发展生产。可见在全民所有制中也还有要解决的矛盾。至于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更是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例如领导人采取平等态度，改进某些规章制度，“两参”“三结合”等等，很多文章可做。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但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的变化。

三十、集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一百四十三页上只讲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条件性，没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必然性。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在我国有些地方就已经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城安县的一个材料，就有一些经济作物的公社现在很富，积极提高到了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使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来解决这个矛盾，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比工人高，对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一四八页上说：“国营企业和合作经济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具有两种形式的公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同资本主义比较起来，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就社会主义经济内部来说，两者的差别又是根本性差别。教科书把这两种公有制的形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就敌对势力来讲，是可以的；如果就它本身的发展过程来讲，那就错了。任何东西都是不能看成是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

若干年以后，人民公社所有制度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全国成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个时期内，仍然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再经过一定时期，才进而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所以，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从按劳分配的变化过程。

三十一、关于个人财产

一四九页上说：“另一部分是消费品，……成为劳动者的个人财产”。这种说法会使人以为社会产品中属于消费品的部分都要分配给劳动者成为个人财产，如文化教育设备、公共医疗、体育设备、公园等等。而且这一部分公共的财产，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每一个劳动者享受，但他不是个人财产。

一五〇页把劳动收入和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及其他日常设备等平列起来，不好。因为储蓄、住宅等等，都是劳动人民收入转化而来的。

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卫生等，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的房屋还很不象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居住条件。我们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该用集体的社会力量来搞，不应该拿个人力量。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搞社会集体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教科书在这里说，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财产包括个人付业。对于这种个人付业不提公有化的问题，这样农民就会永远是农民。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定有一种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否则就会使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僵化比起来，使人们的思想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同一页上说到个人利益同全民利益结合的问题，“这个结合是用按照社会成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来实现的。”这里没有讲必要的扣留，而且把个人利益放

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就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片面化了。

接着在一一五页上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说得很空，不能解决问题。象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年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

三十二、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教科书一五四页的第三段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并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接下去的一段讲得还好。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只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某些方面和领导经济的某些形式会妨碍生产力发展，而且所有制方面（例如两种所有制）也存在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再下面的一段说法就很有问题。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那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有的是非对抗性的，但不能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人民内部各派的斗争。

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但是还有革命。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经过很多的阶段，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这里说到依靠群众“积极活动”来及时克服矛盾（一一五页）。所谓积极活动，就应当包含着复杂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过时的经济关系的阶段”，这个说法对。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虽然这些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也要经过斗争才能解决矛盾。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依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社会主义里，总还有先进的人和落后的人，有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蓬勃的人。有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的人。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乐于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些变化进行抵抗。广东在农村同富裕中农展开八字宪法的辩论，就是证明。

一六六页第三段是讲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斗争，讲得有点生气。但是接着后一段中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三十三、关于认识的辩证过程

一五七页上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

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应该看到，这里要有一个过程。认识规律，总是开始少数人认识，然后是多数人认识。从不认识到认识，要经过实践的过程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得，从来没有先知先觉，人们要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遭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的胜利和失败，并且进行认真研究，就能够逐步地使得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也是不行的。

所谓“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这是不容易的，不经过一定的过程是不能实现的。一五八页上引恩格斯的话：“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地历史”，“才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和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产生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说是“开始”是“愈来愈大”，这就比较准确。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里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够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写出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能例外。

关于工会和一长制

教科书说到工会的使命时，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福利。

教科书提到“依据一长制的原则管理生产。”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都是实行一长制，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所实行的在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就使我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

三十四、从原则出发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从第二章以后，列举了许多规律。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而教科书的办法是不进行分析，文章写得很散。它总是从规律、原理、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经过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从现象出发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却与其相反，他所有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学说，人都是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是从人都要死这个大前提出发得出结论，这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推论。他们不懂得，大前提应当是研究问题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发现和证明原理、原则。

三十五、先进经验能够毫无阻碍的推广吗？

一七八页上说：“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的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可不一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

力量，因此，科学的最新成就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人们不习惯，或者因为人们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就会遇到阻碍。例如，我们的密植、深翻这样的事情，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还是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和抵抗。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的东西的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根本不同的。

三十六、关于计划工作

一八三页上引用恩格斯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

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时经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在这里说：“自发性和自流性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不相容的”，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于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合乎规律的。一定是，有的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就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这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是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

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所有人都成了“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要一次两次的修改，这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认识不完善吗？那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搞不懂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但不是认识够了。如果说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一八四页上说，社会主义的特点是“经常自觉地保持比例”，这是一个任务，一个要求。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斯大林说过，苏联的计划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反映了规律的要求。

经常保持比例，同时也就是经常出现不平衡。因而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就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了，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矛盾。出现了不平衡，出现了不成比例，人们就进一步认识了客观规律。

在计划工作上，如果有什么帐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的漏洞也没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结果都是会破坏比例。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企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建设，耽误了七年的时期。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象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

发展或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三十七、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问题

一六八页上说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经济规律。资本主义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大，也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特别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办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农业并举和其他几个并举，每一个并举中又有主导的方面，农业不上去，许多问题不得解决。我们提出工农并举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〇年。重视农业，就表现在拨给农业的钢材的数量上。一九五九年给农业的钢材只有五十几万吨，今年包括建设一共是一百三十万吨。这算是真正工农并举了。

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使大家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工业同时并举。

只要我们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提高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三十八、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

二十章中说：“利用工人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个人物质利益的

关心，是国营工业高涨的必要条件”（二十八页）。二十一章中说：“彻底实行经济核算，利用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在国家工业化的斗争中和起了重要作用”（五十七页）。二十五章中又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使工作者从物质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一七一页）象这样的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只会带来发展个人主义的危险。

一九六页又说：按劳分配规律“使工作者们物质利益上关心执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计划，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决定性动力之一。”人们不能不问，既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方向，怎么又把个人物质利益说成生产的决定性动力呢？

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应当是生产资料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这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

三十九、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

一九八页虽然承认群众的创造活动，但是说“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二〇〇页上也说“庄员的主动性是发展农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是把群众的斗争只看着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

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创造的，而不是群众创造的。

接着又提到：“首先利用物质鼓励因素”，好象群众的创造活动是要靠物质利益鼓励出来的。这本书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是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这反映了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靠物质鼓励，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半句是要尽量最大的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开，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象这样地宣扬物质利益，唯物主义者成为不战斗的了。

四十、关于平衡和不平衡

二〇七页末一段写得不对。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平衡的方面，也有不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技术发展的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多人，地质勘探的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八年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业劳动还是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来解决这个不平衡。每逢一个新的技术问题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就会特别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也就

感到许多新的东西不相适应。书中的这段话否定了资本主义下的某种平衡，也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

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这本教科书中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都没有，这是不能设想的。任何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之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的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对不平衡所说的，没有了不平衡，就没有平衡。事物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每个部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的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教科书中没有充分运用辩证法，对各个问题都没有用辩证法来研究。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是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 * * * *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

可以有计划的组织经济，所有能够自觉地掌握利用不平衡的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

生产力跃得快，造成了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关系的状况，于是就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求得适应，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是相对的。生产力总是要不断前进，所以总是不平衡的，平衡和不平衡是矛盾的两个侧面，其中不断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否则，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难道独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吗？应当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适用这个规律。矛盾、斗争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不能设想，有一种平衡是没有条件的，是永远的。

我们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教科书提到了国家，但未加以研究，这是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国家论、阶级斗争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革命论，

战略、策略等等。

世界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先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和规律，例如矛盾的统一，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十一、关于所谓“物质刺激”

二一三页上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者为成为社会一切人员生的第一需要”所以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具有重大意义。这里的“一切社会成员”讲得太笼统了。列宁也是社会成员之一，能够说他的劳动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吗？

二一四页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极大多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一些工作人员都不老实对待自己的义务，这个分析是对的。但是要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书上在这里还谈到较为勤勉和积极的工作者在同样条件下能创造更多的产品，是否勤勉积极，显然是决定政治觉悟，而不决定于文化技术水平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另外有一些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一些，可是很勤勉、很积极。原因是前一种人觉悟低一些，后一种人觉悟高一些。

书上说，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二一三页）、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二一四页）。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变化。人不一定年年、月月、天天都要物质刺激。在困难的时

候，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也要干，而且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我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好，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很不好，还有一部分人干的大体上好。物质刺激都是一样，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照他们的道理，是解释不通的。

既使承认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一个原则，在思想方面的精神鼓励的原则。同时，物质刺激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还应该讲集体利益，应该让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在“对劳动的物质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一节（二三四页）中间，关于竞赛有些地方写得还不错。缺点是没有讲政治。

一不死人，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东西也有可以，没有也可以。我们要使人民有所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时期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乐于英雄牺牲，也并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们还健康些，并不为了追

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了，评了级，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人常常为争级别吵架，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实行供给制，但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内战时期多的时候有几十万，少的时候有几万人，抗日时期从一百多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上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以前打了胜仗，在以后还是打了胜仗，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或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者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二十八章说：“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者从物质刺激上关心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二四五页）

二十九章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这里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促使非熟练工作者不断上进，以便进入熟练工人的行列。这个意见就是说，为了要挣钱，就来学文化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个人进学校、学技术、学文化，首先应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首先为了得高工资。

二十九章还说：“按劳分配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力量。”（二六五页）而且在二六七页的末段，在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不断提

高以后，未修改的第三版中还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样的说法。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工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资是消费品的分配，没有生产的发展，就不会有消费品的分配。前者决定后者。

四十二、关于社会主义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

二三二页上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领导人员的威信取决于他们联系群众的程度，取决于人民对他们的信任。”这句话讲的好。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成绩看成是自己的，而看成是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的遵守劳动纪律。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的合作。

四十三、关于突击和超任务

二三三页上说：“消除超任务的现象，按图表均衡地进行生产。”未修订的三版上这句话是：“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工作”。根本否认突击、超任务讲得太绝对了。

不能完全否认突击。突击和不突击是对立的统一。在自然界中，有和风细雨，也有急风暴雨，突击和不突击也是波浪式起伏的。在生产方面的技术革命，常常发生在需要突击的情形。农业生产要论季节，唱戏要有高潮，否定了突击，实际上就是不承认高潮。苏联要赶上美

国，我们要不用苏联那么多的时间达到苏联这样高的水平，这些也都是突击。

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落后者要赶上先进者，这是要经过突击才能达到的。人与人，组与组，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都要竞赛，要赶上先进，也就都会有突击。

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搞土改，合作化，造成减产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原故，不是因为突击的原故。

四十四、关于价值规律于计划工作

二五八页上用小字印的一段正确，有批判，有结论。

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象是吃亏的，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点和其他工业基点。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几点和其他工业基点。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有七千五百多万人，再搞这样

两次大规模的运动，我们的水利问题就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更可以增加得多，增加得快，农业生产可以更稳定。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也就更能满足人民对粮食的需要。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赚了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中自己已经提出来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们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只有富裕中农里面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高兴，他们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

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对于发展生猪有积极作用。但是象现在这样大量地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

二六〇页上说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问题。他们那里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进行调节是不够的，还要有领导、有控制。我国的初级市场的价格因国家统一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成为大自由。

二六一页上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带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由无政府状态产生浪费社会劳动的现象”。这个说法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在社会主义

社会里不发生危机，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当然也是由于它的所有制决定的。

四十五、关于工资形式

二七二页上讲工资形式，主张以计件工资为主，计时工资为辅。

我们是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片面强调计件工资，会造成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一部分工人中“为五大件而斗争”的心理，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有的材料还说明计件工资制还有碍于技术革新和机械化的采用。

书上承认在生产自动化的情况下不宜于实行计件工资。一面说要广泛发展生产自动化，一面说又要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形式，这就自相矛盾起来了。

四十六、关于价格的两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个是消费品价格的问题。书上说：“社会主义一贯实行降低人民消费价格的政策”（二七九页）。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不涨也不降。我国工业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职工生活并不很坏。究竟是不断降低物价好，还是不涨不降好，这是

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是重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价格问题。相对说来，他们是重工业品的价格低。轻工业品的价格高；我们是重工业品的价格高，轻工业品的价格低。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好，也值得研究。

第三部分

(从第三十章到三十四章)

四十七、关于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

第二九七页说到在基本建设中，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大建设单位同时搞得很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而反对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一百个中型、九百个小型钢铁基地的建设。中小型对钢铁工业的发展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了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变成先进的、土的变成洋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而否定落后的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从有史以来，在革命战争中总是拿差武器的人打败拿好武器的人。内战的时候，抗日的时候，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没有全

国的政权，没有近代的兵工厂，如果有了最新武器，才去打仗，那就等于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

我们要实现象教科书上所说的全盘机械化（一三四页），看来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在第三个十年期间。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半机械化和改良工具还是我们要提倡的。现在我们还不一般的提。

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的过火，机械化、自动化讲的过头了，会使人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以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在农业上，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多少年内还不能生产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这个，大家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了。无机肥料也要有，但如果只靠它，而不同有机肥料结合起来使用，会使土壤陈化。

教科书中常说：“在一切部门中采用最新技术”但这不是容易作到总是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且在采用了某种新机器的同时，总有许多旧机器。教科书上说到，一方面是建设新企业，并对现有工厂进行设备更新，同时“充分合理使用现有的机器和机械”（四三八页），这说法就对了。将来永远都是会如此。

至于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一定要自力更生的搞。一九五八年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的口号。事实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到的。过去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靠采用新技术而在生产上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

国家，苏联也靠采用新技术而赶上资本主义国家，我国也一定要这样做也一定能够做到。

四十八、先有拖拉机还是先有合作社？

第三一八页说，“在一九二八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的翻耕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九还是用木犁或马拉犁”，这个事实推翻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关于“要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观点，而同一页上一行所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的进步开辟广阔的场所”则是对的。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主要不是由于他们没有拖拉机（相对地说他们比我们多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恩赐的，他们没收土地是有限额的（有的国家一百公顷以上的土地才没收），是用行政命令来进行没收工作的。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中间整整间歇了五、六年。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农、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争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开展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因此，一步一步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有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我军南下时，各省都配了从省、地到县、区整套的地方工作干部班子。而且一到目的地，立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把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

四十九、关于“一大二公”

苏联的集体农庄过去合并过两次，由二十五万多个合并为七万三千多个，又合并为七万个左右。将来可能还要扩大。教科书上说，要“加强和发展集体农庄的生产联系，组织各集体农庄之间的公用生产企业”等等（三六二页）。有些方面和我们的办法类似，只是不用我们的说法而已。

当然，苏联集体农庄的扩大规模，按户数人数来说，可能不会象我们这样大，因为他们农村人口稀，土地多。但是，能够因为这样，就说现在的集体农庄就不再需要扩大了吗？我们的新疆、青海这些地方虽然人少地多，但是仍然要搞大公社。我国南方几省，有些县（如闽北的一些县）也是在人少地多的条件下搞起了大公社的。

扩大是个重要问题，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提高“公”的水平，也就是说，量变必然带来部分的质变。

五十、特别强调物质利益的原因何在

在集体农庄制度的一章内反复讲个人物质利益。如三二〇、三二二、三一一页等等。

现在特别强调物质利益，总有个人原因。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

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是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个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两重性，任何事物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遗传和变异也是对立统一的两重性，如果只有变异的一面，没有遗传的一面，那么下一代的生物和上一代的生物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狗就不成其为狗，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可以起好的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一定形态固定起来，或者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但是如果只有遗传的一面，没有变异的一面，那末就没有改进、发展，就永远停顿下来了。

五十一、事在人为

书上说：“集体农庄有形成级差地租的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三四三页)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其实也还是事在人为。例如，在河北省，京汉路沿线的机耕很多，京浦路沿线的机耕却很少，自然条件很相似，交通同样方便，但是土地的改良各个不相同，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或不利于改良的原因，也可能有不同的历史原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事在人为”。

同是上海郊区，有的区养猪养得好，有的区却养不好。上海所属的崇明县，原来说那里各种自然条件，例如芦苇多，不利于养猪，现在打破了畏难情绪，对养猪事业采取了积极态度后，却看到这些自然

条件不但不妨碍养猪，反而有利于养猪。实际上精耕细作，机耕化，集体化，都是“事在人为”。北京平昌县，常闹水灾害，修了十三陵，情况变了，还不是“事在人为”吗？河南省计划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以后，再用三年，沿黄河完成九个大中型水渠的建设，也都证明“事在人为”。

五十二、关于运输和商品

运输、包庄，不增加使用价值。但是增加价值。运输、包庄所用的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没有运输、包庄，生产过程就没有完成，不能转到消费过程，使用价值虽然先出来了，也不能实现。例如：煤炭在矿山开采出来了，如果堆在矿山，不由铁路、轮船、汽车运到用户手中，煤炭的使用价值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第三五五页说，他们的商业系统是两套，即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此外，还有所谓“无组织的市场”，即集体农庄市场。我们是一套，把合作社商业合并于国营商业。现在看来，一套好办事，并且各方面节省得多。

第三五七页提到对商业的公共监督。我们对商业的监督主要是靠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这一套。

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社会必要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的消费和生活的消费）。

五十三、关于工农业并举

第四〇八页上说到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未修订的三版本中在这里还特别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

工业的发展是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全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外省运输粮食、运肉类、运输菜，主要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的较慢。我们过去没有了解到，恰恰是东北这样的地方，特别是辽宁这样的省，应当好好抓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

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今年我国估计可能生产钢铁一千四百万吨左右，拿出十分之一的钢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设，其于十分之九的钢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这在今天的条件下，就是工农业并举了，这样做，当然不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发展工业。

第四〇九页上说，在特别时期，要加速落后了的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这是好的。但是农业和轻工业的落后所造成的比例失调，不是局部问题。

第四一〇页上说：“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不

论何时都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这里只讲重工业和轻工业，没有讲工业和农业。

五十四、关于积累水平问题

在波兰，这个问题成为很大问题。他们起初强调物质刺激，增加工人工资，不注意提高工人觉悟，结果，工人只想多要钱，不好好干，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吃老本的情况，现在逼得他不得不出来反对物质刺激，提高精神鼓励，哥穆尔卡也说：“钱是买不到人心的”。

特别强调物质刺激的，看来总是难免走向自己的反面。开了很多的支票，高薪阶层当然满意。广大工人农民要求兑现，不能兑现的时候，就会被迫走到强调物质刺激的反面。

根据第四一八页上所说的情况，苏联积累资金的比重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我国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五八年是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五九年是百分之四十二。看来今后我国积累比重经常保持在三十以上，或者更多，是可能的。主要的问题是生产大发展。只要生产增加了，积累比重大一点，还是可以改变人民生活的。

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这是经常的任务，如果以为只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应当这样做，那时不对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要节约，不要积累了吗？

第四部分

从五十五章到结束语

五十五、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

第四二九——四三〇页上说，“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将变成不需要的东西而逐渐消亡。”但是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很危险。第四三一页上说，即使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就还是必要的，这个提法对。紧接着，书上又说：“但是，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将取决于共产主义的制度的特点，”这句话不好懂，国内即使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所谓国家的形式不外军队、监狱、捉人、杀人等等，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家的这些形式到了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五十六、关于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第四三三页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但是还有敌对阶级的残余。“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只能说，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还要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

书上在这里接着声明：“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道

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矛盾。”不过是附带的声明罢了。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就应当从矛盾的分析出发。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生产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

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他们根据当时社会发展条件所预见到的。进行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新的任务一定又会提出的。

五十七、关于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前途

第四五〇页上说：“集体农庄合作化生产关系的形式完全符合农村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需要。”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看一篇苏联的文章，介绍红十月集体农庄的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不合并时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以后这些事情好办了。说明在共一万人，计划在中心建设一个三千人的居民点，并在中心点周围分建各住一千人的七个居民点。这个材料可以说明现在的集体农庄的形式已经不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了。

书上这里说，要“全力加强和继续发展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既然要发展，要过度，怎么能“全力加强”呢？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要讲巩固，但不能讲得过头。书上讲了模糊的前途，但一讲

到具体措施就不清楚了。

书上讲要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但是在我们看来，首先必须把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所谓把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是要把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工人，由国家统一包起来，发给工资。现在我国农民每人平均全年的收入时是八十五元，将来如达到每人一百五十元，而且大部分由社发的时候，就可以实行基本社有，这样，再进一步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

五十八、关于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距

第四五一页第一段对将来农村的设想很好。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声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五十九、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建立经济体系问题

第四六四页——四六五页上说：“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个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提倡全面发展，不说每个省份不必生产靠其他省份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我

们要各省尽量发展各种生产，只要不妨碍全局。

欧洲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全国大体上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控制太死，地方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拉拉，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作到全国是统一的，各省又是独立的，是相对的统一，又是相对的独立。各省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做出的。例如庐山会议的决议，就是如此。它既合乎全国的需要，合乎于各省的需要。能说只有中央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地方就不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吗？我们是在全国统一计划下，提倡各省尽可能各搞一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够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尽可能去办。以前曾担心，各省都发展了各种工业，象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工业产品会没有人要，现在看起来，并不是这样，上海已经提出了向高大精尖发展的方针，他们还是有事情作。

为什么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呢？正确的办法应当是，各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己尽可能独立的搞，以不依赖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办不到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应当尽可能办好，吃饭靠外国、外省危险得很。

有些国家很小，确有书上所说的情况：“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能胜任的”，那当然不是勉强去搞，我

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六十、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能够“拉平”么？

第四六五页第三段说：“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各国的人口不等，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同，革命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怎么拉得平呢？一个父亲生十个儿子，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聪明些，有的愚蠢些，怎么能够拉平呢？“拉平”是布哈林的均衡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省，一省之内的各县，都不平衡。拿广东省的卫生工作来说，佛山市和岐乐就搞得好，因此佛山和广州不平衡，岐乐和韶关不平衡，反对不平衡是错误的。

六十一、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

第四七七页上说到社会主义国家贷款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这个叙述是符合事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

六十二、关于世界两个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

第四八一页上论述“两个世界体系的竞赛”。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论点。教科书上在这里强

调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强调在两个世界体系间“建立和发展”经济联系。这是把实际上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的观点的后退。

在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教科书避开了这种斗争。

六十三、关于斯大林的批语

第四九三页上说斯大《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著作，正如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论点”（四九三页）所指出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

一条罪状是说斯大林抱着这样的观点：“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

斯大林在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要有商品生产。他说“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都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分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他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关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费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当时的商品生产，同三十年前“列宁宣布必须

以全力搞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乃是必要的东西。”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至于产品交换问题，在斯大林只是一种设想，他并且说过：“推行这种制度无需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

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家的经济计划。教科书提出这个论点其实就使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第一，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的“买卖”并不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是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和他们现在做法的一个真正的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六十四、对教科书总的看法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也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否定这本书，还不能作这个结论。

书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经济，不是为少数剥削者牟利的经济。书上说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能说是错误

的，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说的是这个。书也说了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等等。就这些方面看，这本书还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至于在承认有计划、按比例之后，如何按比例那是另一个问题，各有各的方法。

但是这本书中，有些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书上不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不讲两条腿走路，片面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宣扬物质刺激。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书上不是从矛盾出发。他们实际上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中还有阶级斗争，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社会中还有三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当然这种个人所有制同集体化以前的个人所有制有所不同。那时农民的生活完全建立在个人所有制上，现在是脚踏两只船，主要靠集体，同时又靠个人。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有斗争。教科书上不讲这种矛盾和斗争、不提倡群众运动。书上不承认先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整个社会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再向共产主义过渡。书上用什么“接近”、“融合”的模糊的说法来代替一种所有制变为另一种所有制，一种生产关系变为另一种生产关系的观点。

就这些方面，这本书有严重的缺点，有严重的错误，是部分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没有说服力。读起来没有兴趣。

书上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它总是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只下定义，不讲道理。其实定义应当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书上凭空地提出一大串规律，却不是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发现和证明规律。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不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的。

这本书的写法不是势如破竹，高屋建瓴。问题不突出，文章没有吸引力。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

这本书看来是几个作者分别一章一章地写的，有分工而无统一。没有形式科学体系，加上用的是从定义出发的写法，使人觉得象是一本经济学辞典。作者相当被动，很多地方自己同自己矛盾，后面同前面打架。分工合作，集体写书虽然也是一种方法，但最好的方法是一个为主，带几个助手写，象马克思他们写出来的书是完整、严密、系统、科学的著作。

写书有批评对象，才有生气。这本教科书，虽然也说了一些正确的话，但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许多地方使人觉得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并不是真正内行。看起来这本书是反映了这样的情况：作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没有概念、规律这一套，而作理论工作的人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这两种人没有结合起来，也就是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

这套书表明作者没有辩证法，写经济学教科书也要有哲学头脑，

要有哲学家参加。没有有哲学头脑的作家参加，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教科书来，是不可能的。

这套书的初版是一九五五年初出版的，但是主要的骨架似乎在这以前就定下了。看来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架子就不大高明。

苏联现在也有人不同意这本书的写法。格·科兹洛夫《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一文，对这本书的批评，提出了带根本性的意见。他指出这本书在方法上的缺点，他主张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明规律。他提出了结构方面的建议。

从科兹洛夫这些人的批评看来，在苏联也可能产生作为这本教科书的对立面的另一本教科书来。

初步读过这本书，可以了解他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问题和论点作中心，仔细讨论研究一下，并且搜集一些材料，也看一下不同于这本书的论点的其他已发表的文章和书籍。在争论的问题上，有些什么不同意见都了解一下。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

我们要批评和反对错误的意见，但也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要勇敢也要谨慎。

无论如何他们写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大问题。有了这本书至少可以供我们议论。并且由此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六十五、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

苏联教科书从所有制出发写，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分配何如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个基本矛盾。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发在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的后面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因此，如果照抄马克思的办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可能反而把问题模糊起来，使人不易了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我们写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时也要写全民所有制本身的变革的如下体制，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专管，有的由县管；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不论中央管

的，或者是各级地方管的，都在统一领导下，而又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关于在生产和劳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教科书中除了有句把“同志式的合作互助的关系”这样的话以外，根本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没有在这方面分析和研究。所有制问题解决后的最重要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问题，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一定的所有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之内总有限度，但是在这一一定时期内，人与人在生产和劳动中的关系都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我们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党的领导，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样一套。

关于产品分配，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不能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个人引向“一个爱人、一个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这样为个人不为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六十六、关于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方法

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发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的问题，也是从现

象出发的。敌人大，我们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的、大家都能看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是由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要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多路，每路又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动一个梯队进到了一个据点，而其他的梯队还在运动之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吃它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去牵制其他的敌人。这样，我们在这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我攻敌守。加上他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完全可能消灭这一部分敌人。

* * * * *

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一部书中堆满了材料，不分析，没有逻辑，看不出规律，不好。但是没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见逻辑，看不见历史，而且这种逻辑只是主观主义的逻辑，这本教科书的缺点正在这里。

* * * * *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许多的特殊中间，

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

六十七、哲学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

资产阶级的哲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候，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来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十八世纪又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并不因为已经有了英国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就不要有法国的；并不因为已经有了英国、法国的，就不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当然更是要密切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对于我们说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的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写不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论》，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

候的需要，列宁就写出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动派，保卫列宁主义。我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补遗

（一）关于我国的工业化的问题

苏联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即使这样，我们还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因为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工业产值占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但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可能由此产生松动情绪。

我们“八大”一次会议曾经说过要再第二个五年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可以说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两个说法有点矛盾。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现在看来，我们再有三年，主要工业产品则可以超过英国，然后再有五年，可以实现建立工业体系的任务。

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作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常量超过英国，那么，我们的钢就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方法很有意义。我们永远总是提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方面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上它。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远洋轮船自己运货，说不过去。

一九四九年我国拥有机床九万多台，一九五九年增加到四十三万台。日本一九五七年有六十台，拥有机床多少，这是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机械化水平还很低，从上海就可以看出来。根据最近的调查材料说，那里的现代企业机械化劳动、半机械化劳动、手工业劳动各占三分之一。

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然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从一九六〇年起的十三年中还要紧张的努力。

（二）关于人的地位和能力

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先决定于劳动和个人得能力（二一三页）未必如此。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青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

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些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就不如非干部子弟。

有很多的创造发明，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往往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一个纺织厂创造了一个提高织布机效率的技术，有助于使纺织、织布、印染的能力平衡，这个新技术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小的地方创造出来。

知识是经过困难得到的，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丢了官，“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象“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孔子也是因为许多国家受了挫折，才转过来决心搞学问。他团结了一批“失业者”，想到处出卖劳动力，可是人家不要，一直不得志，没有办法了，只好收集民歌（《诗经》）整理史料（《春秋》）。

历史上许多先进的东西不出在先进的国家，而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国家，英国、法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的德国，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现在许多大学教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普通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但这里确实有个问题。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

是我们打败了他们。

人这种动物有一个毛病，就是看不起人。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是看不起俄国的，中国现在还处于被人家看不起的地位。人们看不起我们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有这么多人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三）关于依靠群众的问题

列宁的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在引了这句话以后说：“广大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际机关地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八页）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不容易。

苏共中央一九二八年的一个决议中说：“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的动员起来”，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六十五页）这个话也说得很好。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斯大林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依靠，只有依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了一点东西了，就不那么依靠群众了。

列宁说，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是要“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

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顺利地发展。”（一六三页）说得好。群众能创造出“道路”来，俄国的苏维埃是群众创造的，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群众创造的。

（四）关于苏联和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比较

教科书一二五页上引用了列宁的话：“国家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进行怠工、破坏、逼着工人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所以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

在内战时期，俄国的困难确实很大。农业破坏了，商业联系打断了，交通运输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对农民实行余量征集制。这实际上是无代价地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在内战结束以后，采用粮食税制来代替余量征集制。

我们的内战时间比他们长得多。二十二年间我们在根据地中历来实行征收公粮和购买粮食的办法。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在战争中紧紧依靠农民。

我们搞了二十二年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过了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所以在全国解放

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对付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为需要富农的粮食，所以对富农采取限制的政策。这有点象我们在解放初期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只有等到集体农业和国营农场——共生产了四亿普特粮食的时期，才对富农下手，提出消灭富农，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口号。（注）而我们呢；却在土地改革政策中，就把富农经济实际上搞垮掉了。

苏联的合作化，“在一开始农业曾经付出过很大的代价”（九十一页），这一点，使东欧许多国家在实现合作化的问题上增加了许多顾虑，不敢大搞，搞起来也很慢。我们的合作化没有减产，反而大大增产。开始很多人不相信，现在相信的人慢慢多起来了。

注：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富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商品粮食在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斯大林全集》十二卷一四八页）

（五）关于总路线的形式和巩固的过程

这两年，我们做了大试验。

全国解放后的初期，我们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

个五年计划时期只能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办法。但是觉得不满意。一九五五年基本完成三个改造的时候，在年底和一九五六年春，找了三十几个干部谈话，结果提出了十大关系，提出多快好省。当时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沙皇时代的俄国原来生产钢约四百万吨，到一九四〇年发展到生产钢一千八百万吨，如果从一九二一年算起，二十年中只增加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都是社会主义，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后来提出两种方法的问题。同时还搞一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此外，当时没有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的跃进以后，出来了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这条辫子，猖狂进攻，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一九五七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回击。同年九月的党的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会等口号，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上多快好省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搞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揭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不准再反冒进，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如无南宁会议搞不出总路线来。五月，xx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八届二次大会作报告，会议正式通过总路线。但是总路线还不巩固。接着搞具体措施，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北戴河提出钢产量翻一翻，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钢铁。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又夹着金门打炮。这些事情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把粮食和付食品吃得紧张起来，刮共产风，百分之

几的日用品供应不上。一九五六年钢产量，北戴河会议完成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又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一切都被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出，两次郑州会议不提，武昌、上海、北京会议不提。等到“左”已经反掉了，指标已经落实了，在反“左”必出右，庐山会议上需要反右的时候，出来反左了。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并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但是，事不过三，恐怕还要准备一个曲折。如果再来一次，总路线也将更加巩固起来了。据浙江省委的材料，有些公社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共产风也可能再次出现。

一九五六年“冒进”的那次曲折，国际上出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七年这次曲折，是全世界反华。

一九五七年庐山会议的两次整风反右，把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残余势力批判得比较彻底，使群众在它的威胁下解放出来。同时破除各种迷信。

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以后合作化了，公私合营以后就解决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提出政治路线上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庐山会议实际上也是进行这个革命，而且是很尖锐的革命，如果不在这次会议把右倾机会主义的那条战线打下去，是不行的。

(六) 关于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及其他

我们应当把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斗争看着一件大事，列宁是把它看成一件大事的。斯大林也这样看，他所说的革命的间接后备军，就是指这个。中国革命根据地也吃过这一碗饭。我们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背后是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只有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那么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内，就只是一部分敌人，而不是全体敌人，而且我们常常能得到休整的时间。

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每个国家派的兵不多，而且不齐心，互相勾心斗角。朝鲜战争中，美国和他们的同盟国也不齐心。战争打不大，不但是美国下不了决心，而且英国不愿意，法国不愿意。

国际资产阶级现在非常不安宁，任何风吹草动的，他们都害怕，警惕性很高，但是章法很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同马克思的时候不同了，变化了。过去大体上七、八年或十年来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一九五九年，十四年中已经来了三次。

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要紧张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以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还没有瓦

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个战败了的帝国主义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弱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对稳定。

（七）中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能够最迅速

西方资产阶级的舆论中，现在也有人承认中国是“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康信公司”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就说到这一点。）

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进行过工业革命，比起以往的所有国家的工业革命，中国看来将是最快的一个。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我们彻底的进行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迷信，力求使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得到彻底解放。

对斯大林《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语

（一九六〇年）

斯大林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见物不见人。供给制促进经济发展有无利，应该扯一扯。有商品生产好，还是没有商品生产好？大家要研究研究。斯大林最后一封信的观点，几乎全都是错的，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

一、二三章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没有弄清楚，如计划经济有话没

有说完。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不够高，比资本主义是快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没有讲清楚。

看起来是吃了亏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没有蓬蓬勃勃的发展。他们是一条腿走路，我们是两条腿走路，他们是讲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只讲专不讲红，只讲干部不讲群众，这也是一条腿。在重工业方面没有找到主要矛盾，如钢是主要基础，机器是心脏，煤是粮食……我们是以钢为纲，是工业的主要矛盾；农业是以粮食为纲，其他是按比例发展。

第一章是讲掌握规律，但怎样掌握规律没有提出。商品生产、价值法则，许多观点我们是赞成的，但也有问题。把商品生产限于生活资料倒不一定。第三封信上的基本观点是不相信农民，主要是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没有找到。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这个形势，我们是保留下来了。价值法则我们要讲计划，并讲政治挂帅，他们只讲生产关系，不讲上层建筑，没有讲政治，没有讲人民的作用。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

（以上是对全书的批语。下面是分章分篇的逐条批语，批语前摘引斯大林原文是根据人民出版社 1958.1.第 3 版译本，表明页码，以便检查对照，更好地领会主席的批语，——翻印者注。）

“……他们把下列两种东西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科学法则，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

一谈的。”①（第一页）

①此法则基本观点正确，但缺点有二：第一，对党和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阐明不够；第二，不够完整，没有说出政府法令之所以正确，不仅处于工人阶级的意志，而且由于如实地反映了客观经济法则的要求。

“……当然，在天文、地址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他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去影响他们。……。②（第二页）”

②这论点不对，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未从发展看问题，现在作不到的，将来作得到。

“对于经济发展法则，对于政治经济学法则——无论在资本主义时期或社会主义时期都一样，——也必须这样说。在这里，也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经济发展的法则是反映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法则……”③（第三页）

③计划经济如何搞？对于轻工业、农业不够重视。

“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地方说：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法则，直到现在都是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法则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这些法则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为将服从他们的统治。’”④（第3页）

④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客观法则，是与人们对立的、独立的；认识了它，就能统治它。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来决定的：第

一，苏维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如象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样，而是消灭了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不得不在任何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⑤（第四页）

⑤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必然性，要去研究它。在成都会议上我曾经说过：要看看我们这一套（多、快、好、省，三个并举，群众路线）会不会翻筋斗，能不能成功？这要几年甚至上十年才能证明。革命规律，过去也有人怀疑，现在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敌人已经被打倒。社会主义建设能否搞起来，人们还有怀疑。中国的作法是否合适于中国经济规律，还要研究，我看大体合适就可以了。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⑥（第4页）

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创造，有苏联的先例，因此应当比苏联搞的好一些，搞糟了就证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行。任务困难而复杂，这与苏联一样。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建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⑦（第5页）

⑦这一段是中心。

“……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

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学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法则的要求。”⑧（第 5-6 页）

⑧此章中心说明，不能把有计划按比例的主观法则与计划混为一谈。我们过去也制定了计划，但经常发生风潮。多了，少了，盲目的碰，不知道怎么才好。经过了曲折，马鞍形的教训，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才找到了农业纲要四十条，现在正在实现，正在制定新四十条。苦战三年再发展，充分讨论再行。是否能实现，还要到客观实践中证明。工业搞了八年，不知道以钢为纲。这是工业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一元论。大、中、小，以大为纲。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矛盾两方面，有主要一面。八年成绩当然是主要的，但是这个摸索过程。不能说我们完全正确计划了生产，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计划是全党来搞，不只是计委、经委，而是各级搞，大家搞。斯大林这段话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并未仔细研究，展开说一说清楚。苏联没有大、中、小，地方中央，工农业并举，都没有两条腿走路，规章制度束缚人。我们也没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掌握，因此我们的计划也没有完全反映客观法则。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白，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

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那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只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制。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了解这样，可与了解成那样。”^⑨（第7页）

⑨这一段分析得到！问题是把它分成二个部分。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

（在原书第7页，对“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这一章，主席有如下一段批语^⑩）

⑩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最终与生产力也有关系，因此，即使是完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了，某些地方仍要通过商品来交换。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的是这样一些国家，在这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为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⑪（第8页）

⑪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看见商品生产就发愁，以为是资本主义。看来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商品生产还要大大发展，货币也要增加。我们现在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似乎有人想立刻宣布全民所有制，剥夺中小生产者。而不宣布范围，究竟是社会所有，还是县所有？这样废除

了商品与商品生产，只宣布全民所有，就会剥夺农民。1955年末连征带购，搞了不到九百亿斤，闹得很利害，人人谈粮食，家家谈统购。这还是购，还不是调拨，后来决定搞830亿斤，才缓和了。这个事实，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人忘了。

“在这里，我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⑫（第8页）

^⑫命运，就是废除商品生产问题。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在某个国家内，也曾在我们国家内，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已经具备……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

^⑬（第8-9页）

^⑬总而言之，没有摸到商品生产的规律。中国经济学家尽是书本马克思主义，碰到经济实践，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我们若犯了错误，就要把农民引入到敌人那里去。

“列宁的回答可以简括如下：^⑭

（甲）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乙）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⑮

（丙）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要逐渐地把他们联合到生

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①⑥

（丁）以一切方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业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他们头等拖拉机和机器；①⑦

（戊）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的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①⑧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策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①⑨（第 9-10 页）

①④这一段分析得正确。拿中国情况看，有发展。这五条都是正确的。

①⑤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赎买政策。

①⑥我们发展人民公社，规模更大。

①⑦我们正在作。

①⑧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商品生产还要搬斯大林，斯大林是搬列宁的。列宁说全力发展商业，我们应当说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商业，问题的性质是农民问题，有人把农民看得比工人还高明。这五

条我们都作了或正在作。有些还发展了，象公社办工业，工农业并举。

①⑨列宁也这样说过。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②⑩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②⑪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等级决定性的经济条件，②⑫而受到极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不能引导到资本主义呢？”②⑬（第 11 页）②⑭这句话有些勉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用的。

（XXX 插话：应该加限度两字。）

②⑮二中全会提到利用、限制、改造政策。

②⑯我们完全没有了这个条件。

②⑰完全正确，我们已经没有这样情况和条件。有些人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了解排除了资本家，可以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们是商品生产还落后的国家，不如巴西、印度。商品生产不是孤立的，看它和什么联系，同资本主义还是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自古有之，历史上叫商朝，就是开始作买卖。殷纣王能文能武，

秦始皇、曹操都变成坏人，这是不对的。尽书信不如无书。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存在了。决定商品（生产）的是周围经济条件，商品生产是否可以看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有力工具呢？我看它是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干部中可以讨论。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②④}（第 11 页）

^{②④}把“我国”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

“……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体农庄的形式。”……^{②⑤}（第 11 页）

^{②⑤}“现今”指 1952 年，革命后的三十年后，我们才九年。

这里提到两种基本形式。人民公社不仅土地机器，而且劳动、种子，其他生产资料也是公社所有，因此产品都归公社所有。不要以为中国农民都是了不起的进步。河南修武县县委书记考虑宣布全民所有，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公粮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这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商品生产应当充分发展，要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要忍耐。战争打了几十年，现在还要忍耐。等台湾解放了，搞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忍耐，不要希望早胜利。

……这是一个特别的，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②⑥}（第 12 页）

②⑥斯大林回避了这个问题。

②⑥斯大林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找到办法和适当的形式。（指集体过渡到全民问题。）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共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②⑦

（第 12 页）

②⑦它的活动不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要属于商品的。农业产品是商品，工业产品不是商品，那如何实行交换呢？这一段把“我国”改为“中国”，读起来就更有兴趣了。

在中国，不仅限于消费品，还有农业生产资料要供应，斯大林不把生产资料卖给农民，赫鲁晓夫改了。

在原书第 13 页上，主席有批语如下：②⑧

②⑧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这两个问题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遗留下来的商品生产问题，目的是巩固工农联盟，发展生产。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很旺盛，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这是现象，要看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光是这一面，还要看到公社的所有制，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属公社集体所有。要象河南修

武县县委书记那样，还要发展商品生产，不要懵懵懂懂地往前闯。

并且我认为，也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地《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是与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但是现在，当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政权和生产资料，反而掌握着政权和占有生产资料^{②⑨}的时候，还使用这些概念，这就非常奇怪了。^{③⑩}现在，在我国的制度下，说劳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用’，这真是十分荒谬的，好象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用，我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一样。^{③⑪}……（第13页）

^{②⑨}特别是工业部门的生产资料。

^{③⑩}商品生产要大发展，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为了发展生产。

^{③⑪}特别在整风后。整风反右后，劳动力不是商品了。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了，劳动力不是商品才解决了。

有时人们问，在我国，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法则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发生作用呢？……^{③⑫}（第14页）

^{③⑫}价值法则不起调节的作用，计划、政治挂帅起调节作用。

“……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③⑬}
（第16页）

^{③⑬}在我们社会里，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即不起决定作用，对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如生猪、钢铁，不用价值法则调节，是靠

计划。

(XXX 插话：斯大林讲到价值法则，盈利不盈利的问题，讲到价值法则时不能搞重工业，讲盈利主要是要讲轻工业。我们是否盈利不盈利的都搞？斯大林讲到这一点与商品生产有矛盾。不起调节作用是对的，但没展开。看来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问题没有解决。)

毛主席对《答 A、B·隆宁那和 B·T 温什尔两同志》的几段批语：(第 64-72 页)

这基本上是错误的，基本观点是不放心农民，不相信农民。对农业机器啃住不放，结果，国家对农民控制得死，农民对国家也控制得死。

整个看来，没有看到人的作用。两个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道路和方法。只说生产关系，不说上层建筑，中国比如说整风运动，干部下放、两参一改、破除旧规，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问题，属于意识形态，政治问题。斯大林不谈上层建筑，只说经济，不说政治。

看来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问题没有解决，大家吹一吹，研究研究。

(XXX 有插话：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划界问题，大家要考虑考虑。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没有展开，那些搞清楚了，那些没有搞清楚，应该研究。)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话不对，翻译得不恰当。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主要表现为制度。我们教育方面的制度破坏了一部分，三风五气也破除了。商品生产，价值法则还不行，现在想要破除一

切法权思想是不可能的。

除右派、富农外，都愿进公社，但不能一步登天。公社一方面要发展自给生产，一方面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是商品不足的国家，是商品粮食不多的国家。公社应多发展商品生产来改善生活。我们的经济学家就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不搞商品生产就发不了工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定要破，工资、待遇、等级，这些是不对的。1953年改工资是对的。那时让些步也是必要的。执行时有缺点，等级过多，这些要破除，象猫和老鼠的关系一样。

公社的体制要注意，还是要有负责的。组织兵团，调动劳动力是有作用的。公社食堂要办好。营养成分要研究。苦战几昼夜是可以的，但要注意休息，农村采取十小时工作制，两小时学习，跟城市不完全一样。陕北还有热炕头，大城市搞公社要慢点，北京自甘落后。

* * * * *

……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别无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

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人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问题（综合汇编）

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

……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的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辩证法

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辩证法。列宁说：“辩证法可以归结为对立的统一（同一、一致、合一）的学说，这样一来辩证法的核心就掌握了。但需要解释和发展。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相对

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和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所以平衡。有本事的人不在于他能做到不发生匈、波事件，而是在向匈、波事件发生后能有办法把问题解决。

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

……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的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象三岁小孩一样，处处要扶，丧魂落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做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于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仍然有些人在顽固地坚持“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要同党委“分权”，要同党委唱对台戏。这样的人，不仅黑龙江有，其他省市也有。有人说：“跟党委一锅里吃饭不香，要另起炉灶。”通过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有些人所以那样坚持“一长制”，实际上是不要党委领导，也就是反对政治挂帅。他们喜欢“一长制”，是因为这块招牌十分有利于他们搞独立王国和进行反党的活动。必须彻底地揭露、批判和清除这种反党思想和反党活动，在党员群众中揭露他们真实面貌。必须贯彻执行党中央早已确定的在企业行政管理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一切方面无例外地贯彻实现党的领导，对此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

一批二帮

对犯有右倾错误的人，我们坚持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帮二批”的方针。一方面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对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都表示欢迎，耐心地教育他们和帮助他们认识与改正错误。除在小组、大组会上根据上述精神进行揭发批判外，党委还同他们做了恳切交心的谈话，承认他们过去做过好事，鼓励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地段责任制”的反动实质

有人借着整社和实行包工包产的机会，推行所谓“地段责任制”。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牌，主张把土地、牲畜、农具、劳力，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他们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为“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单干户。这里明显地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道路，这种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最后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不彻底加以肃清，党的总路线是不可能顺利地贯彻执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不能顺利进行的。对于这种思想，各地党委应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险恶面目彻底揭露，把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彻底搞臭，以保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为什么我们必须肯定成绩

只有对已经做出的事业，有了正确的认识，对成绩有充分的估计，才能对未来的事业充满信心，奋勇前进！

看问题要看本质，要看主流

看问题要看本质，要看主流。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它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是不是搞国际主义，这三点就构成了一

条路线。你们是，中国共产党也是反帝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党。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些方面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本质，这些都是表现。例如反对帝国主义就是表现。是不是坚决，可以作过比较，象铁托是不是坚决？他的东西，我们看总是讲美帝国主义好，讲苏联不好。

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

各省、市、自治区的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开，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总要有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的，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委书记，不管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在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对休整，主张勇猛果敢，乘胜直追一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使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相互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急和缓也有同一性；休息和苦战

也有同一性。睡觉和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后不睡觉？古云：“久卧者思起”。睡觉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宴席。”¹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就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了。生产资料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是为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就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都是对立的统一，是相互转化的。鞍钢的生产是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

¹ 林黛玉因席终人散而感伤，这是形而上学，是不懂得有聚必有分的客观规律。王熙凤很不讨人喜欢，但她说：“千里搭帐篷，没有不散的宴席”，却是辩证法。

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就成了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相互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们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得多生得多。例如猪，如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辞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来的，是何者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氧十二种原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统治阶级讲的，而不是对老百姓讲的，这是讲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转化的。

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硬化。

有限转化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的，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他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比古代冷的多了，冰寒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烈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实践、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老要看经典著作，而要靠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辩证法。

中世纪的形而上学。

文艺复兴。

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

封建时代的经学——形而上学。

现在又讲辩证法。

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问题很熟习。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敲起来。

当然，我们并不因为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不加劲干了。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要代替大国沙文主义，有什么可怕的。

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

斯大林的形而上学。

现在的辩证法。

这也是否定的否定。

有紧张，有休整

有紧张，有休整，常紧张不幸，又紧张又松弛，太累了不行。河北、河南大办的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睡。我们要有紧有弛，张而不驰文武

不能也，驰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有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阿Q最伤心的事情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起心不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是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困难。

对立面转化

中国有一个好处，一个是穷，一个是百（无知识）。这也是有两性，穷就要革命，知识少是不好的，但好比这张白纸。这一面写过了，就没有什么文章好做，这一面没有写过，是空白的，就大有文章好做，几十年后，就可以赶上外国。

听取对立面的意见

尊重唯物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

“死”活斗争问题

“死”活斗争问题。“死”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没有死也不行，统的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一九五九年的钢如果是二千七百万吨，二千五百万吨必须卡死，二百万吨是活的，如果三千万吨，就是五百万吨是活的，如果超过三千万吨，还

可以分成。食油多的多吃，少的少吃，这就活了。死者保证重点，活着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分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真理。

真理与谬误是对立的，正确是与错误斗争产生的

真理与谬误是对立的，正确是与错误斗争产生的。美和丑是对立的，没有好人就没有坏人，没有坏人就没有好人，没有大坏人就没有大好人，香花和毒草，我们不怕毒草，长多了所有的人都挖了。真理是和错误作斗争种发展起来的。在斗争中，好人增加，坏人减少。什么是毒草？我问过布尔加宁，西红柿一百多年前在欧洲是毒草。我也讲过许多历史人物，耶苏、伽利略、哥白尼、马丁路德、孙中山、共产党等等，都曾被认为毒草。这个阶段认为是毒草，那个阶级认为是香花。如杜勒斯是美国资产阶级的香花，但是全世界人民认为他是毒草。蒋介石是什么？是香花又是毒草，香过，大革命时期香过，抗战时期叫过万岁，蒋委员长，是我的老朋友。这些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斗争，有比较才能辨别，才能发展，没有比较怎能办到？马列主义是和资产阶级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设置对立面

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

面，发动劳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几乎占了一半。三十万的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人民，对我们有利。另外一种自然界不存在的，但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认为的办法设立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它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立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制造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的造，但要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着规律就上去了。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的现象，莫洛托夫分裂我看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教育了我们的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人为地制造莫洛托夫、陈独秀、高岗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才出来，没有什么可怕，要克服他们。所谓乐观主义是我们主导的方面。忧愁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能急？我就有点急。要将领导艺术，变坏事为好事，早早预见到了也可以使它不发生，发生了也可以变成好事。一千二百万党员有二、三万有觉悟、有预见，就不怕，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路线错误，要允许他改过，如XXX。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事，中央、地方都很好，反冒进问题现在搞清楚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设置对立面很重要

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如：我们对于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设立对立面。

整风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双反，也是为了设立对立面。

所谓对立面，要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研究辩证法问题

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很好。如果是“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就会欢迎的。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都是对立统一。两条腿走路也是对立统一，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内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

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在我们这样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搞大的东西，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搞出“八字宪法”：水（利）、肥（料）、土（壤）、种（子）、密（植）、保、工（工具改革）、管（理），水是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也包含者共产主义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应该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构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又抓生产，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

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致相符，避免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而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題，没有考虑可能性的问題，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題。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到二千万吨。是否可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到二千三百万吨都可以；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要订那么多，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问题。实践也包括我们的领导干部的努力在内。提的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样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怎说是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提出抢先，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看起来不象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准备进入，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即使我们可能进入也不应该。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不都是学习列宁嘛？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偿。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上犯错误，

这也是个问题，要讲互相有利。辩证法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对同志要采取辩证法的方法

在团结问题上我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是不是敌人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法的方法，而不应该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 XXXX 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 XXXX 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语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自称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法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

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的同志，第一就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批，二曰帮（或一批二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就不同。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象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地相互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来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种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的间隔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入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歧，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象一进入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跟着

帝国主义开谈判（对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再举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们做斗争，一只手跟它们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们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有些人你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认为一个人是不可以加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面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的统一的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做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优点，第二点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容许人革命，人家犯了错误，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是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写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皮上长了几处癞疮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得愈厉害，结果闹得极为被动。但是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赵太爷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赵太爷也还是不准。对于黄逸峯、张秀山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正。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缺乏“帮”的人，思想是不正确的，人家犯了错误，你去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高岗跌跟头就是跌在这上面，他无中生有的说什么四人圈圈，两个摊摊。就算有吧，也应当是一看二帮。但是，高岗不愿意这样做，结果跌倒了爬不起来。对于革命来说总是人多一点好。犯错误的人，其中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并且每次错误都有份以外的，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很多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们的尾巴翘得太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达到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

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个指头的问题

劲可鼓不可泄，有时没有注意，给群众以挫折。一个时期一些问题发生了错误，如合作社曾有人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好。举登徒子好色赋为例，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个办法不好，右派就用这个办法攻击我们，人有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生疮，应该把它医好，不是把它破掉，另外九个指头还是好的。往往有人看到一个指头坏了，就说十个指头都坏了。右派是这样攻击我们的，但好人也有时这样看，共产党也有这样的人。共产党也好，民主党派、工商界、知识分子也好，多数人是可能进步的，就是右派多数也是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好的。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于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有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了错误也是如此。我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XXX、陈再励、李峯。吴芝圃同

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黑指头了。李世农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我讲的犯错误同志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人是在大风浪中有动摇，现在又看清楚了，不是指那些人。要团结，要保护，要坚持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下了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有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个干部，青岛会议文件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与四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产阶级的，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东西。他们长期反对人民的脑筋一下子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XXX说反革命还要反复的，还提到群众路线，讲的很好，资产阶级也会起风波，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摇摆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反复。但有了去年这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波起稳坐钓鱼船。波、匈事件我们没有问题，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一半，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他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进攻了吗？他们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不

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丢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辩证法则是对立的统一的看待问题所以是全面的

……辩证法是对立的统一看待问题，所以是全面的。主席讲：生同死，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的矛盾的，实际上他们之间又有内在联系，所以有时这种对立又能统一。我们认为问题不能只看到一面，应该全面分析，透视它的本质，这样对认识一个人来说，说不可能一下子什么都好，一下子又坏得不得了，连一点好处都没有。为什么我们党是正确得呢？就是因为我们认识 and 解决一切问题都能从客观情况出发，这样就比较全面而不绝对化。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

合作社发展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一波一波地前进，两波之间有一伏，两山之间有一谷。

领导要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情况不好，立即“刹车”。

在适当时机压缩人们的脑子，在膨胀起来的时候是必要的。有人说，是不是要忧虑要有清规戒律，当然要，必要的清规戒律，必要的忧虑都是要的，猪八戒还要有三规五戒。必要的间歇，必要的暂停，必要刹车、关闸都要的，办法是当人们尾巴翘起一半的时候，就给人们提出新任务，比如我们现在比质量，使人们没有时间，来不及骄傲。

片面性有两种

片面性有两种，教条主义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XXX“文章中已说过了。教条主义想肯定一切（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查一查，经过十年（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四年）差不多都没有了。教条主义中国有，外国也有，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化，他们是从形而上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工作只准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在围剿王蒙”（我也是过甚其词）现在我们来解围。要把王蒙救出来。他写文章有缺点，但他批评官僚主义就批评不得？官方人士讲不得？过去我们搞阶级斗争，确很有多学问，但也产生了一些简单化，行政命令。过去因为搞革命斗争，要迅速，有些问题确实不能多花时间讨论，要坚决，这是夺取政权时间的办法。一些同志养成这样作风，只有这些经验与办法，特别是在军队中工作久的，容易犯毛病。围剿王蒙就象解放军作战中调几个团把敌人包围一样。另外一个“否定一切”。否定工农的事业，否定几亿人民的斗争，使人丧失信心。一切都是黑暗，这不合乎事实。社会主义建设大事业，一切都好，也不合乎事实。社会主义建设大事业，一切都好，也不合乎事实。钟惦裴做了一件好事，揭露电影事业中的缺点，要注意把所揭露的缺点都加以改进，但片面性的要把它指出。陈其通等四个人的文章传达错了，今天要当面声明，我很不赞成那文章。我说过：“他们忠心耿耿想要保卫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仇视毒草的情绪。”但是才“放”了几个月，出了王蒙、牛鬼蛇神等等。认为成绩甚少坏处甚多，“报告老爷，大事不好了，出了妖怪。”大有不可终日之势。

这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对党的方针是怀疑的，采取的方针是简单化，无说服力的，批评王蒙的方法是“短促突击”，使人看了就不服。我就不服，我和王蒙既素不相识，跟他又不是儿女亲家，但我不服。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这两派都是片面性，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都是形而上学，但都要帮助他改正错误，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代表了很多人的问题。共产党员里面有，党外没有吗？五百万中有教条主义也有机会主义，共产党内也有“左”派（有括弧的左派），右派，即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有人说，写文章不可能没有片面性，这话也有点道理。我刚才说没有那么多的马克思，要求人人没有片面性，这不可能，也不合乎实际。事实上批评起来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话的，是站在一个方面说话的，但是另一个方面，片面性是违反辩证法的法则的。可不可以要求多点辩证法呢？是否可以把辩证法逐步推广，逐步学起来呢？我想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有更多的人，更多的作家、教授，看问题比较全面性。所以说，有片面性是事实，但是要要求逐步克服片面性。是否以后就没有呢？还会有的，一万年还会有片面性，得推广辩证法。辩证法还会发展，总之要求逐步推广辩证法，六亿辩证家。人民内部的事情，要分析，要讲道理，不靠扣帽子，要辩证法。写文章时要有说服力，不要摆官僚架子，拿着官柱子，以为自己是部长、局长、处长，要把这些抛到九霄云外，要忘记自己是官，要跟任何人平等，官虽大，错了还是不成的。斯大林的官还不大？错了，还是不成。摆老资格“我革命时期还在桌子底下爬”，拿出这一条，人家就不爱听。

辩证法逐步多些。形而上学逐步少些，就是逐渐克服片面性。

两种片面性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多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方法是“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来说，“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

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 永远地普遍地存在

……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两种可能性问题

两种可能性问题。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

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过中央；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发，这就是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你说不作，实际作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则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夫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能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晦灭亡这种可能性的，人民共和国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敌人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这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

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一打开报以看尽说干劲冲天，搞的神乎其神，飘飘然。其实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钢，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了七千五百亿斤，即翻一翻多一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所以打折扣。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来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会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托儿所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住，所有这些倒霉的事，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失败，都证明了一点，我们的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了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灭亡，帝国主义灭亡，则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则是暂时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拿起枪来打游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百年，人要准备后事。我们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还想干他几年，……。

两种可能性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如果现在去火星就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将来可能是现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有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过去教条主义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吗？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十万不结婚，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波浪式的规律展发前进是必然的

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的，四平八稳的前进着，建设也是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马儿跑得快一点，有时马儿跑得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也下马，这种情况完全是可能得。因为，第一是我们没有经验，第二是我们经济建设要以形势为转移。比如过去经济建设可能搞快了一些，那时因为当时存在战争形式，如果马上打仗的话，重工业搞多一点，就有必要。经济建设得进行是波浪式的，有起有伏，一波逐一波，就是说，有平衡、破裂，有破裂之后，又恢复平衡。当然波浪的起伏也不能太大，不要一下子反冒进，一下子反保守，可是循着波浪式的规律发展前进则是必然的。如果承认了这点，那么今年冒进一点就不是了不得，明年搞少些也就得了么。总的来讲，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正确的。（对于这点，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是特别强调指出的。）

任何事物都要统一性和独立性

现在来谈谈每个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人也有统一性和独立性。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

以后是独立性，有的人去散步，有的人去读书，有的人去吃饭，各人有各个的独立性，纪律性和无纪律是相对立的东西，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性，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的独立性、无纪律性，“自由主义”，一直把会开下去，无休止的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所以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人都要有独立性，都要有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重视。

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

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各地都必须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那种特殊，而是为整个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

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都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的太死。可以统一的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地方应当争取这个权力，不要怕戴地方主义的帽子，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发的争权，不能叫地方主义。中央准许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这不能

叫闹独立性。